

北京师范大学

科学论文选集

(社会科学 一)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科 学 论 文 选 集

(社会科学一)

1959年10月1日

編 者 的 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尤其是從去年以來，北京師範大學的科學研究工作有了極大的發展。在全國人民熱烈慶祝建國十周年的時候，我們從師生已發表的科學論文中選出若干篇編輯成“科學論文選集”三冊，計社會科學兩冊，自然科學一冊，向國慶獻禮。選入本集的這些文章有的是目前在學術界頗有爭論的問題，有的作者還在進一步探索；輯一家之言或一個階段的研究成果廣為交流，也許會有益於學術發展，會鼓舞我們更加前進！由於水平和時間所限，編選和校印工作都可能存在不少缺點，希望讀者同志們指正。

北京師範大學學報編輯委員會

1959年9月28日

北 京 师 范 大 学
科学論文选集
(社会科学第一集)

編輯者：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編輯委员会
出版者：北 京 师 范 大 学
印刷者：北 京 崇 文 印 刷 厂

1959年10月1日出版

北京师范大学
科学论文选集
(社会科学 一)

目 录

学习党的教育方针·····	黄 济 (1—15)
关于河南长葛第三中学贯彻勤俭办学勤工俭学的考察报告·····	王焕助 (16—30)
太平天国教育政策初探·····	陈景磐 (31—49)
孔子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	陈景磐 (50—61)
胡适教育思想批判引论·····	王焕助 (62—76)
批判詹姆士所谓“心理学是自然科学”·····	郭一岑 (77—89)
批判实用主义者杜威在心理学方面的反动观点·····	朱智贤 (90—117)
对心理学的对象、任务和方法的几点看法·····	陈耀眉 (118—125)
历史教学上的古与今·····	白寿彝 (126—133)
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几个问题·····	何兹全 (134—165)
略论区分奴隶与农奴的理论标准·····	刘家和 (166—176)
刘知几的进步的史学思想·····	白寿彝 (177—202)
明代工匠出身的建筑家·····	张鸿翔 (203—215)
影印明本册府元龟序·····	陈 垣 (216—217)

A Collection of Selected Theses

(Social Science, Vol.1)

Peking Pedagogical University

Contents

A Study of the Educational Polic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y Huang Chi (1—15)
Report of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Carrying Out of the Principles of “Industry in School Management” and of Principles of students self- help through labour in school in Ch’ang-ke Third Middle School of Honan Province	by wang Huan-hsun (16—30)
A Preliminary Study of the Educational policy of T’ai P’ing T’ien Kuo.....	by Ch’en Ching-p’an (31—49)
The Place of Confucius in the Chinese History of Education.....	by Ch’en Ching-p’an (50—61)
An Introductory Criticism on Hu Shih’s Educational Ideas	by wang Huan-hsun (62—76)
A Criticism on william James’ So Called “Psychology is a Natural Science”.....	by Kuo I-ch’in (77—89)
A Criticism on the Pragmatist John Dewey’s Reactionary Viewpo- int in the Field of Psychology.....	by Chu Chih-hsien (90—117)
A Few Points Concerning the Object, the Task, and the Method of Psychology.....	by Ch’en Kuo-mei (118—125)
The Old and New in the Teaching of History.....	by Pai Shou-i (126—133)
Some Problems on the Ancient Society of China...by Ho TZe-ch’uan	(134—165)
Some Considerations on the Theoretical standard for Distinguishing a Slave from a Serf	by Liu Chia-ho (166—176)
Liu Chih-chi’s Progressive Thought on History	by Pai Shou-i (177—202)
A Study on the Architects of Craftmen’s origin of the Ming Dyna- ty.....	by Chang Hung-hsiang (203—215)
Preface to the Photomechanical Ming edition of Tse Fu Yuan Kuei	by Ch’en Yuan (216—217)

Обзорник научных статей
Пекинский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Сер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 № I)

Содержание

Изучение курса партии в области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Хуан Цзи (1—15)
Обследовательские доклады по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ю третьей средней школой, уезда Чан-го провинции Хэнань, принципа “Управление школой в духе бережливости и трудолюбия и одновременное занятие учебой и трудом в духе бережливости и трудолюбия”	Ван Хуан-сюнь (16—30)
Тай пин тянь го о политике просвещения	Чэнь Цин-пань (31—49)
Роль Конфуция в истории китайской педагогики	Чэнь Цин-пань (50—61)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критике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х идей Ху Ши	Ван Хуан-сюнь (62—76)
Критика положения Джемса “Психология есть естественная наука”	Го И-чэнь (77—89)
Критика реакционных взглядов прагматиста Дьюи в области психологии	Чжу Чжи-сянь (90—117)
Несколько слов о предмете, задаче и методе психологии ...	Чэнь Го-мэй (118—125)
Античность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 в преподавании истории	Бай Шоу-и (126—133)
Некоторые вопросы о древнем обществе Китая	Хо Цзы-цюань (134—165)
Коротко о 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м критерии по разделению рабов и крепостных.	Лю Чзя-хэ (166—176)
О прогрессивной идее Лю Чжи-ди в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науке	Бай Шоу-и (177—202)
Зодчие Мин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происходившие из мастеровых.	Чжан Хон-сян (203—215)
Предисловие к фотографическому изданию Минского Издания “Це Фу Юань Гуй” (Большая летописн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Сунской династии)	Чэнь-Юань (216—217)

学习党的教育方针

黄 济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为了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这个教育方针同资产阶级的为教育而教育，劳心与劳力分离，教育由专家领导的教育方针有着根本的区别。

毛泽东同志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关于文化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作了明确的指示：“一定社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这是我们对于文化和政治、经济的关系及政治和经济的认识的基本观点。”作为一定社会的上层建筑的教育，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它又反过来积极地为政治和经济服务；因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所以一定的教育，总是很明显地为一定阶级的政治路线服务。中国革命(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因此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方针，便成为党的一贯的教育工作方针，但由于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的革命政治任务不同，所以贯彻这一教育方针的具体要求、内容和措施也就有所不同。目前党的教育方针，是我国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反过来又为我国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服务的，贯彻这一教育方针所要培养出来的人，即是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党的教育方针，是我们教育工作中的总的方向，是我国进行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一盏指路明灯。全部教育工作，从小学到大学，从学校教育到社会教育，都必须在这一教育方针的指导下进行。在一切教育工作中，贯彻了这一教育方针，即是正确的；违反了这一教育方针，即是错误的。

一 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

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在阶级的社会中，教育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是从教育的本质，即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中得出的科学的结论。它是客观的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论你承认它，还是不承认它，它总是要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从历史

上来看，教育这个工具，当它掌握在反动的统治阶级的手里时，它就成为用来麻痹和压迫广大的劳动人民，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当它一旦为被压迫的革命阶级所掌握时，它就成为组织和教育群众，起来反抗剥削和压迫，进行革命斗争的工具。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教育是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也即是为广大的劳动人民的利益服务的，它成为消灭阶级和消灭剥削制度，改造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的工具。因而无产阶级敢于公开承认教育为政治服务这一客观真理。

历史上的一切反动阶级，他们不敢公开承认教育为政治服务这一客观事实，他们常常用许多抽象或漂亮的词句，来掩盖教育为反动政治服务的实质，麻痹和欺骗广大的劳动群众，以维护其反动的统治。因而有些人也为其所愚弄，信以为真，似乎强调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是共产党人故意强加于教育上来的。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早已指出，“共产党人并没有臆造什么社会对教育影响”，而是科学地说明这一事实。

历史是最有力的见证人，让我们打开历史看看，教育同政治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那些所谓教育“超政治”、“超阶级”的鬼话，在胡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我们就以清末中国开始创办学堂以后的事实为例吧：一九〇六年（光绪三十二年）清廷学部正式规定教育宗旨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他们认为，前二条是“中国政教之所固有，而亟宜发明以距异说者”，后三条是“中国民质之所最缺，而亟易针砭以图振奋者”。从这一教育宗旨中，不难看出当时的教育反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政治的实质。到辛亥革命之后，推翻了满清的统治，资产阶级暂时取得了政权，在教育上也立即反映出一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当时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发表了“新教育的意见”，批判了满清政府所定的教育宗旨中的“忠君”和“尊孔”两项，认为“尚公、尚武、尚实”三项和他所讲的公民道德教育、军国民主义教育及实利主义教育相似，并给予了新的解释。这些改变，正是反映了中国当时政治上新的变化。不久袁世凯称帝，一九一四年在他所规定的“教育纲要”里面，又把“崇奉古圣贤”、“尊孔尚孟”等等订为教育宗旨。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帝对中国的侵略日益加剧，杜威也在这时来中国讲学，传播反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九二二年全国教育联合会提去了“新学制”，并附有“七项标准”，其中有什么“适应社会之进化”、“发挥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等等。所谓“适应社会之进化”，其所指的是什么社会，不言而喻，要“进化”即是反对革命；所谓“发挥平民教育精神”，也不外乎是宣扬资产阶级的民主；所谓“谋个性之发展”，正是实用主义教育中“儿童中心主义”的反映，是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发展。在这些漂亮的词句下，传播着美国资产阶级的反动实用主义教育理论。以后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党化教育，特务教育，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教育，日益加剧。在学校开设“党义”、“公民”、“新世训”等课程，而且举行所谓“周会”，这实际上都是散播反动思想，毒害青年的措施。蒋介石为了推行其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统治，对

青年提出十二条守则（“一、忠勇为爱国之本；二、孝顺为齐家之本；三、仁爱为接物之本；四、信义为立业之本；五、和平为处世之本；六、礼节为治事之本；七、服从为负责之本；八、勤俭为服务之本；九、正洁为强身之本；十、助人为快乐之本；十一、学问为济世之本；十二、有恒为成功之本。”），作为训育纲要，要求青年身体力行。陈立夫更露骨地提出“管教养卫”的反动教育政策。学校还设有国民党、三青团以及特务等反动组织。总之，凡能做反动统治的工具，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推行他们的反动政策的，就受到他们的“提拔”和“赏识”。而另一方面，则封闭传播进步思想的学校，查禁进步图书杂志，大量开除、逮捕、屠杀有进步思想的教师和学生。在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教育为反动的政治服务，国民党利用教育来巩固它的反动统治，迫害进步力量，是最明显不过的了。正如毛泽东同志一九三四年一月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与人民委员会对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所指出的：“国民党统治下一切文化教育机关，是操在地主资产阶级手里的。他们的教育政策，是一方面实行反动的武断宣传，以消灭被压迫阶级的革命思想，一方面施行愚民政策，将工农群众排除于教育之外。反革命的国民党把教育经费拿了作为进攻革命的军费，学校大部分停办，学生大部分失学。因此在国民党统治之下，造成了人民的愚昧无知，全国文盲数目占全国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对于革命文化思想则采取极端残酷的白色恐怖。任何进步的文学家、社会科学家，一切文化教育机关中的革命分子，都要受到国民党法西斯蒂的摧残。使一切文化教育机关变成黑暗的地狱，这就是国民党的教育政策。”从上述的旧中国统治阶级的教育宗旨及其具体措施来看，不正是说明了，当政治一发生变化，教育的方针、政策和教育目的等也就立即随着发生变化，教育是政治的反映和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实质吗？

除此以外，在旧中国还有许多教育派别和一部分所谓“教育家”者流，他们高唱着“教育救国”，“教育超政治”，企图用教育的手段来解决中国的社会问题。这些教育派别和教育家们，在他们的实践过程中，有的逐渐同人民的力量接近，改变了自己原来的政治立场，在人民的教育中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其中有不少的是干脆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服了务，他们之所谓“教育救国”、“民族再造”、“从复兴农村入手，以达于新社会建设的成功”等等漂亮的口号，实际上只是为反动统治阶级的粪堆插上了花朵，迷糊了劳动人民的认识，从而欺骗和麻痹了劳动人民，并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们的斗争意志，也就是这样，帮助了中外反动派在中国的统治。我们具体地来看看“乡村建设”派和“平民教育”派的反动面目吧。梁漱溟在乡村学校中大搞所谓“精神讲话”，实际上是进行的完完全全的封建道德教育；大搞所谓“自卫训练”，实际上正如他所自白的那样：是用来防止“土匪”和“共党”的骚扰。晏阳初以搞平民教育为名，进行社会调查工作，结果是为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作了情报工作。我们看看“平民教育”对人民进行的教育是什么，在农民千字课中有一课名为“知足歌”的，这样写着：“一群少年去赶集，人家骑马我骑驴，回头看见推车汉，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我们不难看出他对人

民进行的是什么样的奴化教育，这种教育到底对誰有利？所以他們得到封建軍閥和帝国主义的支持，成为他們的宠儿，并不是偶然的。教育又那里是超政治的！

从以上所述，可見所謂教育“超政治”，“超階級”“为教育而教育”等論調，不但是违反科学事实的，而其它所起的作用也常常是反动的。在旧社会高唱教育“超政治”、“超階級”的論調，其实質往往是在掩飾反动的教育为反动的政治服务的本質，麻痺劳动人民的斗争意志，其所起作用，恰恰是为反动的政治服务，因此它为当时的反动統治階級所欢迎。在今天提出教育“超政治”、“为教育而教育”，其所起作用，是反对教育为无产階級的政治服务，使教育脱离社会主义的道路，而走向資本主义的道路，这也恰中資产階級的心怀，为資产階級所賞識，因此我們也必須予以坚决地反击和彻底地揭露。对这些梦想“为教育而教育”的人們，我們应当大喊一声，使他們猛醒过来，别再蹈过去那些所謂“超政治”的“教育家”者流的复轍，因为这条路在新中国是走不通的。

教育必須为政治服务，既定客观的規律，那么，社会主义的教育，就必须为无产階級的政治服务，这是沒有任何異議的事了。社会主义的教育，是巩固无产階級专政，消灭剝削階級、剝削制度及其残余，为建设社会主义和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服务。教育掌握在工人階級的手里，就成为改造旧社会和建設新社会的工具。

教育如何为无产階級的政治服务？首先，要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使教育成为无产階級专政的工具，要在教育战綫上开展“兴无灭資”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为彻底消灭一切剝削階級和剝削制度及其残余，建成社会主义和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而奋斗。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階級同資产階級的矛盾，是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的矛盾。目前我国虽然在經濟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取得了基本胜利，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經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所有制的革命还没有最后完成，而資产階級思想还将长期的存在，在政治战綫和思想战綫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即社会主义同資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还是当前的主要斗争任务。为此，我們的教育工作，必須适应这种政治状况，并为这种政治斗争服务。过渡时期教育工作为无产階級政治服务的基本任务，就是要加强人民群众的共产主义教育，以无产階級专政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精神改造老的一代和教育新的一代，破資本主义的思想，立共产主义的思想，也就是要使受教育者同形形色色的資产階級思想彻底决裂，成为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人。因此，在一切学校中，必須加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第一，加强工人階級的級阶观点的教育，树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政治方向，站稳无产階級立場，同資产階級和資产階級思想进行坚决的斗争。根据毛主席提出的六条政治标准教育学生，加强总路綫的教育，加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和革命传统的教育。第二，加强群众观点和集体观点的教育，正确認識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作用，相信群众，对群众运动抱有正确的态度，虛心向群众学习，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树立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的观点，培养集体主义的思想情感和生活习惯，坚决与資产階級个人主义进行斗争。第三，加强劳

动观点，即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的观点的教育，使受教育者能够做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热爱体力劳动，热爱劳动人民，坚决与轻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主张劳心与劳力分离的资产阶级观点进行斗争。第四，加强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的教育，树立受教育者的科学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使受教育者学会在认识事物上做到主客观一致，学会从实际出发，全面地、发展地看问题的科学分析的思想方法，反对脱离实际地和片面地、静止地看问题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和方法。“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思想方法，必须坚决地予以克服。完成上述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思想政治教育任务，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基本条件之一。此外，还必须使受教育者有系统地一步步地掌握现代文化科学知识和技术，并且养成从事劳动的习惯，成为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新型的劳动者。只有当我们培养出来的人是无限忠实于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又红又专的劳动者的时候，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最终胜利，才有绝对的保证。所以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教育工作中实现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目的。

其次，要保证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使教育为工农大众服务。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即社会主义国家，工农联盟是我们国家的基础。既然、工农联盟是我们国家的基础，为什么我们的教育不应该明确地规定为工农服务呢？我们的一切教育工作者，必须全心全意的为工农服务，提高他们的文化科学水平，把本来是劳动人民创造的文化科学知识，归还给劳动人民，加强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巩固工农联盟，提高他们的建设和创造的力量，使我们的社会主义加速完成，并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一切条件。所以反对教育为工农服务，也就是反对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也就是反对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这是同我们国家的性质根本相违反的。

我们主张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必须为工农服务，这是我们教育工作中的阶级路线。但有人却反对我们教育工作中阶级路线的贯彻，说什么他“对教育贯彻阶级路线不满，地主、资本家的子女无罪、不应限制他们受教育，教育机会应均等，不应有阶级区别”。这种思想，不仅是对我们教育工作中阶级路线的抵触，而且是对我们教育工作中阶级路线的歪曲。我们说我们的教育工作必须贯彻阶级路线，并不是说我们的教育工作要把剥削阶级出身的子女，推出学校大门之外，事实也并不是如此。对剥削阶级的子女，也要使他们受到教育，但使他们受教育，目的在于改造他们成为劳动者，成为劳动人民的继承人，而不是培养剥削阶级的继承人。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教育目的，是不允许有任何的动摇的。

由此可见，无论是过去和现在，教育必须为政治服务，这是一条确定不够的真理。不过所不同的是：旧社会反动的教育，是为少数剥削阶级服务，用来欺骗、麻痹和压榨广大的劳动人民，教育成为维护反动统治的工具，对社会是起着促退的作用；而我们

天的社会主义教育，是为广大的劳动人民服务，为消灭阶级，消灭剥削，改造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服务，它对社会起着促进的作用。因此，社会主义教育，同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的教育，就有着本质的不同，是教育上的根本的转变。由于我们从一九五七年以后，在教育工作中贯彻了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的方针，加强了党的领导，实现了政治挂帅，开展了“兴无灭资”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因而使教育工作出现了一个完全新的局面，广大师生的思想政治面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在学生中由于进行了反右斗争，整风运动，开设了社会主义教育课，对学生思想中的一些大是大非的问题（如合作化问题，统购统销问题，红与专的关系问题，知识分子参加生产劳动的问题等等）展开了群众性的辩论和讨论，并且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用了报告辩论，参观访问和参加实际锻炼等理论结合实践的方式方法，因而大大地提高了学生的社会主义觉悟。在提高觉悟、解放思想、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思想基础，上学生发扬了敢想、敢说、敢做的共产主义风格，大搞科学研究，积极参加教育改革。在高等学校中，在集体合作的方式下写出了许多科学论文和专著，编出了许多新的教学大纲和教材使一九五八年一年的成绩。超过解放后九年来的好几倍。甚至在中、小学的学生中，也作出了不少的科学研究和创造性的成果，在教师方面，由于经过反右斗争，整风运动和“反保守、反浪费”的教学改革运动，思想觉悟也大大地提高了一步，工作的积极性提高了，同党的关系密切了，新的师生关系也开始建立起来了，有的教师感激地说出：“党就是在治病救人，在给我治好了身体重病之后，又给我医治思想上的重病，一个母亲对他心爱的儿女的关怀也不能比这更深了。”因而终于肯定了自己要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的政治方向，提出了入党的要求，现在已被批准入党。这只是无数事例中的一个，象这样的事例，是举不胜举的。在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教育方针的指导下，启发了广大师生的政治热情，大家决心要在党的领导下，在社会主义事业中，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二 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是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的根本方针。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和教育与生产劳动分离，是无产阶级的教育同资产阶级以及过去一切剥削阶级的教育的根本分歧。

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由于阶级对立的出现，加深和巩固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在社会上分裂成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少数的剥削者，他们垄断了文化科学知识的教育，作为他们自身的享受和阶级统治的工具；同时广大的劳动人民被排挤于学校之外，剥夺了享受文化科学知识教育的机会，陷于无文化的状态。其结果不仅加深了阶级的对立，而且也阻碍了文化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在中外历史上都是如此的。（当然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初期，由于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曾经对社会文化的发展起过促进的作用。在这里不准备再作详细的论述。）

在剥削制度下，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教育与生产劳动之间也就存在着不可混淆的界限。“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这些思想，是符合剥削阶级要求的，因而也就成为几千年来剥削阶级教育中的指导思想。“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也正是这种思想的反映。所以在旧时的教育中，根本谈不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问题。

事实虽然如此，但是，还有人总以为在旧社会、在剥削制度下和剥削阶级中也有人讲过劳动或劳动教育的问题，如认为“资产阶级很重视劳动教育”，“清朝的颜李学派也主张教育结合生产劳动”等等。因而得出结论说，我们今天提出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问题，“只是演进，不是跃进，也不是革命”。让我们再来看看这些事实的实质是什么吧：资产阶级及其学者们所重视的所谓劳动教育，其本质不在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更不是为了把资产阶级子女培养成为劳动者和把劳动人民培养成为有文化科学知识的人，而是为了对劳动人民进行劳动训练，为资产阶级造成“既能替主人创造利润，同时又不会惊扰主人的安宁和闲逸”（列宁：“青年团底任务”）的适用的奴仆。事实完全是如此的。所以资产阶级对劳动人民所进行的劳动训练，目的在于加强劳心者对劳力者的剥削和压迫，其结果是加强了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对立，绝不会达到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结合。另外说什么中国封建时代的颜李学派也主张教育结合生产劳动，这也不完全是事实，颜习斋和李恕谷是我国十七世纪的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在他们的思想中有人民性和唯物主义的东西，如在颜习斋的言论中，确实常常以工人的筑路、水手的掌舵、农夫的种田、裁缝的成衣等作为例证，他对劳动和劳动人民也表现了某些正确的观点和论断。但这只是他自身生活的一些体验和对当时反动封建阶级的不满及对劳动人民同情的一些表现，根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他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更不能以他的教育思想代替当时占有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教育思想。正如陆定一同志在“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一文中所指出的：“就教育史的主要侧面说来，几千年来教育，确是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而社会主义教育乃是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作为剥削阶级手中的工具的教育，是坚决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分离的，因为这是一切剥削阶级的教育的主要特点之一。只有教育成为工人阶级手中的工具时，才能做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此来加速消灭历史上遗留下来一切剥削制度的残余，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灭城市和乡村的差别，最终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去。所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只能是工人阶级的教育思想，而不能是其他任何剥削阶级的教育思想。

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实质是什么呢？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实质，就是要使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即是使教育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过渡到共产主义服务，为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服务。也即是改造旧社会和建设新社会，为改造旧人和培养新人服务。马克思早在“哥达纲领批判”中即已指出，“生产劳动和教育

的早期結合是改造現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又告訴我們：“未來教育的胚芽，是从工厂制度發生的；这种教育使每一个已达到一定年令的儿童，都把生产劳动和智育、体育結合起来，这不仅是增加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列宁在“民粹派空洞計劃的典型”一文中也指出：“如果不把青年一代的教学和生产劳动結合起来，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我們不可能把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者把脱离相应的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提到現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識現狀所要求的那种高度”。毛主席早在一九三四年在第二次全国苏維埃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即已指出：“苏維埃文化教育的总方針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以共产主义的精神来教育广大的劳苦民众，在于使文化教育为革命战争与阶级斗争服务，在于使教育与劳动联系起来，在于使广大的中国民众都成为享受文明幸福的人”。我們的革命領袖的这些指示，不正是說明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結合，是共产主义教育的根本原則，是使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是改造旧社会和建設新社会、改造旧人和培养新人的最根本的手段嗎？

当我们今天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設和在政治战綫上和思想战綫上进行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时候，即是在“同过去遗传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和“同过去遗传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为彻底地建成社会主义并为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作准备的时候，教育与生产劳动結合的問題，即具有特別重要的意义。如果不能認真地做好教育与生产劳动結合这一步，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也是不会彻底的。所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結合的方針的貫徹，是我們的教育工作中的一次大革命。因为第一，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消灭一切剝削阶级和剝削制度及其残余（包括政治、經濟和思想等方面），这是一个极其深刻的革命，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最后的决战。教育与生产劳动結合，是知識分子劳动化，和正在成长的青年一代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的必經之路，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和培养全面发展人的重要手段，而且是最終的消灭剝削制度的残余，特別是消灭资产阶级思想的根本途径。当前知識分子下放鍛炼和学校开展勤工俭学的成績，都充分地証明了这一点。一九五八年以来，广大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学生，由于参加了生产劳动，大大地提高了社会主义觉悟，培养了工农的情感和艰苦奋斗、勤俭朴素等优良品質。如有些大学生在参加生产劳动之后，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驗說：“过去对恩格斯所說的劳动創造世界这句话，了解的很抽象，經過实际参加生产，对这句话才深有体会，过去那只是恩格斯的話，現在才变成我們的話”。不少的学生在劳动中做出了許多动人的事蹟：当炼铁爐炼焦爐出了問題时，他們頂着湿棉被冒着高溫去搶修；当洪水暴发时，他們和工农一起冒着狂风暴雨去护堤搶險。有的高等学校的学生在劳动中提出这样豪迈的口号：“口渴想起上甘岭，艰苦想起柯察金，困难想起吳运鐸，飢餓想起老紅軍，”他們热爱工农学习工农的干劲；他們所表現的干劲，也常常为工农所夸奖：“真是毛主席的好学生，这和过去的

学生完全不同了。”这就是在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贯彻后，知识分子的思想面貌所发生的根本变化。所以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是无产阶级最终地战胜资产阶级、是社会主义最终地战胜资本主义的全部斗争中一件最有力的武器。第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方针的贯彻，是建设社会主义和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重要条件。因为。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首先必须不断地提高生产水平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和劳动本领而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正提供了这样一种客观条件。由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必然加速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多快好省地发展教育事业，培养出大批的又红又专的建设人材，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同时由于党的“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的方针的实施，在农村也出现了大办工业的创举，出现了工人兼农民和农民兼工人的现象；也出现了学校办工厂、农场、和工厂、农场办学校的现象，这样亦工、亦农、亦学的共产主义的萌芽，在我们生活中已经可以看到。特别是由于人民公社的创建，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局面，已越来越明显。这些措施，必将加速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差别的消灭，城市和乡村差别的消灭，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好一切条件。因此，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不仅是一项教育的措施，而且是一项政治的措施，它将使我国六亿五千万人口，人人能生产，人人能学习，变成既是劳动者又是知识分子的新人。

下面我们再谈谈关于全面发展的問題。

全面发展的新人的出现，是党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方针实施的必然结果。

关于全面发展的問題，本来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提出。所谓全面发展的人，其基本的特征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统一。毛主席根据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要求，具体地阐明了全面发展的人的含义，即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就是说我们要培养的是既有政治觉悟又有文化的、既能从事脑力劳动又能从事体力劳动的全面发展的新人。我们所培养的全面发展的新人同旧社会所培养出来的理论脱离实际和高人一等的所谓“通才”，有着本质的不同。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基本途径，即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马克思早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根据大工业的生产，得出了将来工人阶级一旦掌握了政权后，人们必然走向全面发展这一科学的预见，并在许多著作中阐明了这一问题。因为大工业的生产是同高度的技术基础相联系的，而且大工业的基础是革命的，这种高度的技术基础和技术不断革新的结果，必然会引起劳动者职能的变更和劳动者全面的运动性，如果劳动者不是处于被压迫和被剥削的地位，而是社会的主人，劳动者要掌握机器和管理生产，就必须全面地了解生产系统，因而就要求劳动者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文化科学技术水平，以适应生产发展的要求。同时由于生产的发展，产品极大的丰富和提高，也提供了劳动者学习文化科学

技术的物质条件和時間。这样人的全面发展就完全成为可能。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中，也同样地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就更加需要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现在已被机器动摇了的分工，即把一个人变成农民，把另外一个人变成鞋匠，把第三人变成工厂工人，把第四人变成交易所投机者的这种分工，将完全消失。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和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因此，教育就会使他们摆脱现代这种分工所造成的片面性。这样一来，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的各方面的才能，而同时各个不同的阶级也就必然消失。”我们过去教条主义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讲的有关全面发展教育的基本原理，而没有深刻地体会到这一基本原理的精神实质。我们只知道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必须同大工业生产相结合，而没有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寻求一条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初步结合和逐步提高的途径。我们错误地把恩格斯所说的那种熟悉整个生产系统而能够自由选择职业的人，当做了我们生活的现实。因之，要实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就必须同大工业的生产劳动相结合，如果达不到同近代工业结合的目的，即认为无法实施。而没有真正地了解全面发展的精神实质，也不了解实现全面发展的具体步骤，更没有考虑到中国目前可能做到的是什么，而且忘却了我们老区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方面的宝贵经验，其结果当然是行不通的。这正如列宁所说的：共产主义是必须而且能够“教育、训练和培养出全面发展的、受有全面训练的人，而能够做一切事情的人。”但“目前就企图具体实现那完全发展的、完全巩固和形成的、完全开展和成熟的共产主义所造就的这种未来结果，就无异于教四岁小孩去学高等数学”（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过去我们在理解全面发展这一问题上，就是犯过这样的错误。

毛主席在解决我国的教育问题上，同解决中国革命及建设中的其他问题一样，是创造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全面发展的学说。抓住了这一学说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核心内容，不是从马克思主义的词句出发，而是从其精神实质出发，并创造地结合中国的实际加以解决。他不仅明确地指出了我们教育的培养目标，而且指出了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具体途径，他指示我们：学校可以办工厂、作坊和农场，也可以同当地的工厂和合作社订立参加劳动的合同，也可以参加农副业生产劳动或服务性的劳动等等。他不仅指示了我们应当根据学校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条件来采取不同的措施，而且也指示我们应当同工业、农业、手工业作多种方式的结合。毛主席的这些指示，完全是从我国的特点（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众多、地区辽阔的农业国家，是一个经济和文化还落后而且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等等）出发来解决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问题的，这就是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于中国实际的典范，因而也就解决了在我们教育工作中长期悬而未决的问题，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全面发展的教育学说，并使